

红军干部团—— 长征中的“流动学校”

□ 钱 锋 沈 思



界首渡江码头石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11月27日，特科营接到干部团急令：在湘江界首渡口架设一座浮桥。特科营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难万苦抵达界首，苦战一夜，最终按时完成任务。这座浮桥经受住敌机轮番轰炸，保障红军西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贵州省黄平、余庆、瓮安地区，被乌江挡住去路。1935年元旦，在对岸有敌军防守、后有敌军紧追不舍的紧迫形势下，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下达架设乌江桥的任务。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接领任务后，立即

率领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工兵连官兵将由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骇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但几次现场模拟还是不可行。一筹莫展之际，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出一个办法：在竹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竹篓内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浮桥。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奋斗，工兵连终于将浮桥架到江对岸，确保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随即指挥四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两场战斗，一是二渡赤水前攻打土城，二是二渡赤水后再克遵义。

1935年1月28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突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陷入困境，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有力打击了敌人。土城战斗后

的第二天，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了敌人。

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10团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人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为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160余里，迅速占领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

高点，俘敌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究战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年9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留下的赫赫战绩，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的精彩篇章。

（摘自2022年8月11日《中国国防报》）





“863”计划倡导者：科学泰斗胸怀祖国

□ 刘诗瑶

1986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助推我国高技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背后的主要倡导者是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他们都荣获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最美奋斗者”称号。

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实践证明，唯有掌握高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占据先发优势，获得更大主动权。而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考验，迫切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助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

王大珩院士是光学家，王淦昌院士是核物理学家，杨嘉墀院士是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陈芳允院士是无线电电子学家。4位科学家在各自深耕领域很有建树，对祖国未来充满着同样的热爱与忧虑。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

发展高技术的建议。收到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后，邓小平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广泛、全面、充分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是1986年3月提出的，故简称“863”计划。

从此，上万名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丰硕成果。随着“863”计划的深入实施，我国在信息技术、

能源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生物和医药技术、深海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863”计划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积极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技术发展道路，培养、锻炼了众多高技术人才队伍，支撑我国在新世纪的科技发展后劲十足，为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还促进了高技术的国际交流合作。

（摘自2021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上接1版）积极稳妥推进地方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坚持实战导向推进市县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打破警种、部门、系统之间壁垒，推动组织重构、机制重塑和流程再造，持续提升主战主防能力，让机构设置更科学、责任分工更清晰、指挥行动更集约、警务效能更高效。

改革完善新型警务运行机制。突出“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集约高效牵引，加强情报指挥体系建设，完善常态化研判、扁平化指挥、合成化作战平台，优化警力配置、健全办案机制，强化数据共享、部门警种联动、网上网下同步应对，构建实战化、扁平化、合成化的新型警务运行机制，不断提高警务运行效能和整体战斗力。在情报指挥上，突出情报信息主导支撑，建立健全“快反135”机制，广泛应用公安科技创新，有效实现资源、力量、数据、手段的高度集成快速响应，实现警力优化部署和警情可视化快速高效处置；在侦查办案上，建强合成作战中心，推动警

力投入、后勤装备、科技手段、情报信息最大限度向实战聚焦，让反应更快速、打击更精准、防范更有力、应对更有效；在治安防控上，坚持和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警种资源，夯实基层基础，汇聚群防群治力量，继续推行派出所“两队一室”“一村（格）一警”建设，加快健全新型社区警务机制，推动基层警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执法运行上，完善细化执法制度，严密执法监督机制，加强执法办案中心建设，做精做细做强执法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能力水平，狠抓执法突出问题整治，高质量深化法治公安建设。

深化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新质生产力和新质公安战斗力都源于先进前沿科技的发展应用，必须坚定不移走科技兴警之路，下大力气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深化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

激发改革新动能，培育新质公安战斗力。毋庸讳言，基础情报数据支撑弱、警务人力资源消耗大、专业研判能力不足、数据壁垒突出且共享有限已经成为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的问题短板。要强化科技支撑，扎实推进公安大数据战略，落实好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打击违法犯罪、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优化政务服务，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统筹建设贴近实战、符合需求、高效支撑的一体化大数据实战中心，畅通数据赋能渠道，以大数据高效赋能情报指挥、侦查破案、合成作战、勤务运行、支撑保障、执法管理、社区警务，推动基础工作全面扎实、警情处置主动积极、防打犯罪精准高效、社会治理智能精细、政务服务智慧便捷。通过科技创新与公安工作有机融合，让大数据深度赋能警种业务系统，赋能机关基层基础，赋能公安执法办案、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群众全流程全链条，全面提升公安工作质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质公安战斗力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特征，更显创新性、更具融合性、更有可持续性，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新驱动，是打造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我们要突出创新驱动，在专业上出硬招、在机制上出实招、在大数据上出新招，全力提升情报、指挥、行动能力，加快推进同警务体制改革相适应、相衔接、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和派出所运行机制，推动各项公安改革系统集成、高度融合、协同高效，把智慧公安建设融入公安机关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推改革、促发展、抓队伍各项工作，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



1909年廖仲恺（后右）、何香凝（后左）及廖梦醒（前右）、廖承志（前左）在东京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廖承志一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廖承志的三重身份

廖承志在香港时身兼三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同时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还是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建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建议由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办事处。1937年10月，毛泽东与廖承志进行长谈：“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谈话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3项职责：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动态向中央报告。

1938年1月初，廖承志抵达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刚开始在宋庆龄家中开会和办公，后来会址设在西摩道21号。保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寇敌的英雄事迹，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承志充分发挥“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地方党的协助下，发动香港海员工会、余乐社、惠阳青年会、学生赈济会、晨钟社等团体进行义卖募捐；一方面广泛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为了方便华侨捐款接收，廖承志通过他在华比银行任副经理的表妹夫邓文钊，在华比银行开设账户，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

1938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的指示，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

此外，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成立、发展、壮大均与廖承志的支持、帮助、组织密不可分。廖承志发起和领导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为建立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何香凝参与了“所有救济活动”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廖仲恺、何香凝带廖梦醒和廖承志去孙中山家道贺。廖梦醒说：“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廖承志也尊敬地称宋庆龄为叔婆。他说：“叔婆，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保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任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担任“保盟”的办公室主任，目标主要有2个方面内容：（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捐款、医药物资，在香港的3年多时间里，共送出120多吨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平均每个月送出3吨。华侨每捐一笔款，何香凝就送一幅画。宋庆龄曾说，抗战时期，何香凝参加了我举办的所有救济活动。宋庆龄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在捐款收据上签名。甚至许多人为了得到她的签名

廖承志一家在香港统战

□ 李向锋

而捐款，为此宋庆龄“磨硬了自己的手指”。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宋庆龄表示何香凝参与了自己组织的所有募捐活动。

邓文钊亏钱办《华商报》

1941年2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受国民党压迫，其他在港媒体被收买的情况下，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华商晚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让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办报。办报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

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为了增强华商寓意，头版正中还刊载了何东爵士题词“唤醒侨胞”。

《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到8月底，《华商报》成为香港晚报销量王者，超过5500份。

廖承志表示，《华商报》开办迄今（8月）由邓文钊出资本，由于稿酬丰厚，每个月亏损3500港币。为了弥补亏空，邓文钊用2万港币购买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同时和陈嘉庚合作准备筹办日报。胡绳曾评价邓文钊：“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国民党对《华商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压迫取缔，一是由戴笠出面向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提出取缔《华商报》的要求；二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由比利时政府向华比银行施压，逼迫邓氏兄弟停止督印《华商报》；三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给《华商报》发通讯稿，并企图破坏其与印刷厂关系。廖承志针对国民党的破坏，一方面请宋庆龄与俞允时沟通，另一方面请周恩来与英方进行沟通协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九龙机场。《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9日发表宋庆龄文章《战争来到香港》，号召对法西斯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加緊团结》，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摘自2024年1月18日《人民政协报》）

